

语林指瑕

杜甫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诗云:“剑外忽传收蓟北,初闻啼泪满衣裳。却看妻子愁何在,漫卷诗书喜欲狂。白日放歌须纵酒,青春作伴好还乡。即从巴峡穿巫峡,便下襄阳向洛阳。”

此诗作于代宗广德元年(763)春,其时杜甫客居梓州(治今四川绵阳市三台县)。上年(即宝应元年)冬,官军

屡破史朝义叛军,克东京洛阳,叛军以占据的徐赵等十州请降。广德元年正月,叛军将领田承嗣,伪范阳节度李怀仙以魏州幽州请降,逃至幽州

的史朝义穷蹙自缢,李怀仙斩其首传长安。自此,河南河北沦陷地得以收复,祸唐八年的安史之乱方告结束。杜甫知此消息,欣喜若狂,下笔如有神助,成此名篇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科院文研所《唐诗选》中,对此诗的注释存在三处“硬伤”,谨陈于后:其一,史朝义是被斩首以传长安还是被擒送至长安?

题注中云:“据《旧唐书·史思明传》,宝应元年(762)十月,仆固怀恩等屡破史朝义军,次年正月,史军兵变,擒史降唐。”

检其本传,宝应“二年(即广德元年—引者注)正月,贼伪节度李怀仙于冀州生擒之(指史朝义)送款(到)来降,枭首至阙下。”而《旧唐书·代宗本纪》云:宝应元年冬十月,“贼范阳尹李怀仙斩史朝义首来献,请降。”(注:元年冬十月,是官军大败叛军,史朝义自缢是在翌年正月。)

史朝义到底是擒而后斩,还是缢而后斩?当然是后者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言史朝义自缢后,李怀仙传首长安,未记年月;《代宗本纪》却记载,广德元年正月“甲申(正月初九),史朝义自杀。”《通鉴》也是将史朝义之死定在该年正月。就是李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,“甲辰(正月二十九),朝义首至京。”

史朝义到底是擒而后斩,还是缢而后斩?当然是后者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言史朝义自缢后,李怀仙传首长安,未记年月;《代宗本纪》却记载,广德元年正月“甲申(正月初九),史朝义自杀。”《通鉴》也是将史朝义之死定在该年正月。就是李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,“甲辰(正月二十九),朝义首至京。”

史朝义到底是擒而后斩,还是缢而后斩?当然是后者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言史朝义自缢后,李怀仙传首长安,未记年月;《代宗本纪》却记载,广德元年正月“甲申(正月初九),史朝义自杀。”《通鉴》也是将史朝义之死定在该年正月。就是李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,“甲辰(正月二十九),朝义首至京。”

史朝义到底是擒而后斩,还是缢而后斩?当然是后者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言史朝义自缢后,李怀仙传首长安,未记年月;《代宗本纪》却记载,广德元年正月“甲申(正月初九),史朝义自杀。”《通鉴》也是将史朝义之死定在该年正月。就是李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,“甲辰(正月二十九),朝义首至京。”

史朝义到底是擒而后斩,还是缢而后斩?当然是后者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言史朝义自缢后,李怀仙传首长安,未记年月;《代宗本纪》却记载,广德元年正月“甲申(正月初九),史朝义自杀。”《通鉴》也是将史朝义之死定在该年正月。就是李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,“甲辰(正月二十九),朝义首至京。”

史朝义到底是擒而后斩,还是缢而后斩?当然是后者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言史朝义自缢后,李怀仙传首长安,未记年月;《代宗本纪》却记载,广德元年正月“甲申(正月初九),史朝义自杀。”《通鉴》也是将史朝义之死定在该年正月。就是李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,“甲辰(正月二十九),朝义首至京。”

史朝义到底是擒而后斩,还是缢而后斩?当然是后者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言史朝义自缢后,李怀仙传首长安,未记年月;《代宗本纪》却记载,广德元年正月“甲申(正月初九),史朝义自杀。”《通鉴》也是将史朝义之死定在该年正月。就是李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,“甲辰(正月二十九),朝义首至京。”

史朝义到底是擒而后斩,还是缢而后斩?当然是后者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言史朝义自缢后,李怀仙传首长安,未记年月;《代宗本纪》却记载,广德元年正月“甲申(正月初九),史朝义自杀。”《通鉴》也是将史朝义之死定在该年正月。就是李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,“甲辰(正月二十九),朝义首至京。”

史朝义到底是擒而后斩,还是缢而后斩?当然是后者。《新唐书》本传言史朝义自缢后,李怀仙传首长安,未记年月;《代宗本纪》却记载,广德元年正月“甲申(正月初九),史朝义自杀。”《通鉴》也是将史朝义之死定在该年正月。就是李怀仙取其首以献仆固怀恩,“甲辰(正月二十九),朝义首至京。”

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注中的『硬伤』

若是擒史降唐,史朝义又在长安被斩,那史书自然要明书其事,试想后来宪宗时官军征淮西,擒吴元济解至长安而后斩,《新唐书·宪宗本纪》记载:“(元和十二年)十一月丙戌,吴元济伏诛。”《通鉴》,亦云:“十一月,上御兴安门受俘,遂以吴元济献庙社,斩于独柳下。”倘若巨凶史朝义被斩“阙下”,史籍焉能不书?

所以《唐诗选》注中,用了讹误的记载,便也以讹传讹了。

其二,关于“河南河北”的解释。

题解注中又云:“河南河北”,指今洛阳一带及河北省北部。此解释亦有误。因为当时收复的十餘州中,有官军攻克的怀州、东都,归顺的还有汴、相、卫、洛、邢、赵、定、深、恒、易诸州,还有史朝义自杀后其将李怀仙和田承嗣归顺的魏州。幽州固然在今河北省北部,然而邢、洛、定、深诸州,均在今河北省中部和南部。“河北”者,中原黄河以北诸州也。

其三,此巴峡非彼巴峡。

注中云:“结尾两句预拟‘还乡’路线:出峡东下,抵襄阳,然后由陆路向洛阳故家进发。字里行间透露出诗人无限的欣喜。长江在川鄂一带多峡谷,‘巴峡’,疑指重庆至涪陵一带山峡。‘巫峡’,三峡之一,在今四川巫山县东。”

萧涤非先生认为,杜甫时在梓州,其地在今四川成都东北绵阳境内,预拟沿水路下赴襄阳。其所要经过的“巴峡”,即《三巴记》中所记载的巴峡:“阆、白二水合流,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,曲折三曲,有如巴字,亦曰巴江,经峻峡中,谓之巴峡。”阆、白二水,即嘉陵江上游,杜诗巴峡指此。若指长江今重庆涪陵一带山峡则此处尚属遥远。杜甫遣词,当不至如是。至于长江中巴东三峡之巴峡,尤在巫峡之东,那就更遥远了。

□杨乾坤

『白云生处有人家』还是『白云深处』

“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”不少人耳熟能详的诗句出现在了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中。然而也有人疑问,不是“白云深处有人家”吗?到底是怎么回事?对此,人民教育出版社表示,综合文献价值及诗意考虑,教材选用了“白云生处”。

人教社介绍,在杜牧自己的《樊川集》中,用“生处”的较多,目前较为通行、权威的点校本《杜牧集系年校注》(中华书局2008年版)和《樊川文集校注》(巴蜀书社2007年版)也都用了“生处”;“深处”则常见于他人著作对杜牧诗句的转引中,文献价值逊于前者。

另外,从诗意上看,“生处”可以理解为“白云形成的地方”,而“深处”则可理解为“云雾缭绕的深处”,两个意思都能讲通。但明代何良俊在《四友斋丛说》卷三十六“考文”中评述道,“杜牧之诗‘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’,亦有亲笔刻在甲秀堂帖中。今刻本作‘深’,不逮‘生’字远甚。”他直言,用“生”字意境更佳。人教社表示,综合考虑上述条件,教材便选用了“白云生处有人家”这一版本。

在小学语文教材中,类似的情况不仅这一处。三年级上册古诗《赠刘景文》中的“最是橙黄橘绿时”一句,也有另一个版本写作“正是橙黄橘绿时”。据介绍,宋魏庆的著作《诗人玉屑》等书选用了“正”字版本;而点校本《苏轼诗集》(中华书局1982年版)中,出现此句时均使用了“最”字,其可信度和文献价值更高。同时,这句诗的大意是,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,莫过于橙黄橘绿的秋景。如果用“最”字,语气上会比“正”更加强烈,更能贴合作者想表达的情绪。因此,教材和点校本《苏轼诗集》保持一致,选用了“最是橙黄橘绿时”。

“两说”的情形不仅出现在诗句中,有时连标题也存在两种说法并存的情况。比如三年级下册古诗《惠崇春江晚景》,题目就有“晚景”和“晓景”两种说法。人教社介绍,从《苏轼诗集》的不同版本和相关文献来看,“晚景”和“晓景”各有依据,难以轻易判定孰对孰错。近年来,学界也有人针对这个问题进行考辨,但各路说法的证据都不充分,难下定论。编写组查阅的清代施元之评注的《施注苏诗》(文渊阁四库全书本)、清代王文治辑注的《苏轼诗集》(中华书局1982年版)、清查慎行注的《苏诗补注》(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)等多种知名的苏诗注本中,均以“晚景”为题,因此,教材最终采纳了“晚景”这一说法。

□牛伟坤

西安:众关之中 盛世汉唐

钩 沉

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,被视为古都西安象征的大雁塔,还有著名的华清池、碑林、乾陵等等。的确,历史上曾经有十多个王朝在西安建都,建都时间长达1100年。其中,西汉和唐朝,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的黄金时代,给西安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。

那么,到底是哪些主要因素造就了西安的辉煌呢?

为何建都西安:金城千里,天府之国

公元前202年,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打败项羽,准备定都洛阳。这个时候,一个叫蒯彻的草根士子却建议刘邦建都长安(明朝以前,西安称长安)。毕竟,建都是百年大计,关系到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。而蒯彻只是一个草根,刘邦拿不定主意,于是征求身边文武大臣们的意见。大臣们的意见也不统一,总体上反对的多,赞成的少。

就在犹豫的时候,刘邦想到了一个人——张良,他在重大决策方面深得刘邦信任。张良首先肯定了蒯彻的分析,接着,用8个字进一步强调了建都关中的优势,“金城千里,天府之国”(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),非常适合建都。

张良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?

长安位于关中平原的核心地带,处在黄土高原东南部,黄河中游,四面山河环绕。为了军事防御的需要,在关中平原四周的山谷、河畔的险要地方设置有一些关隘:东面有函谷关、潼关与蒲津关,南面有子午关与武关,北边有萧关与金锁关,西边有陇关与大散关。所谓关中,就是“在众多关隘之中”的意思。一旦军情紧急,四面闭关自守,往往“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”。

“天府之国”又是什么意思呢?在秦岭和北山之间,形成了一块天然的盆地平原,东西长约八百里,东部宽阔,有三四百里,逐渐向西缩减为百十里宽。所以,这块盆地被形象地称为“八百里秦川”。在这个盆地区域,渭河及其支流泾河自西向东流入黄河,形成冲积平原,水源丰沛,土壤肥沃,为发展农业提供了天然便利的条件。因此,在古人眼里,关中地区好像上天赐予人间的美好家园,被张良形象地称为“天府之国”。

于是,不久之后,汉高祖刘邦就带领文武大臣浩浩荡荡从洛阳迁到长安。

盛世汉唐的记忆

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,讲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的三大盛世,分别是西汉的“文景之治”、唐朝的“贞观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。所谓“之治”“盛世”都是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,其标志是政治稳定、经济发展、文化繁荣等。但令人惊讶的是,这三大盛世全部出现在建都西安时期。

“文景之治”后,汉朝出现了什么局面呢?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记载,“国家无事,非遇水旱之灾,民则人给家足,都鄙廩庾皆满,而府库余财货。京师之钱累巨万,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,充溢露积于外,至腐败不可食”(《史记·平准书》)。这段话说的是经过“文景之治”,到了汉文帝初期国家的经济状况:整个国家太平无事,如果不是遇到水旱灾害,老百姓家家富足;首都和地方州县仓库里装满了粮食,国家府库有节余的财货。京师长安国库积累了巨万的铜钱,穿钱的绳子都断了,无法数清有多少。国家太仓的粟米一层压一层,装不下了露在外面,甚至有些都放坏了没法吃,可见当时的富裕情景。

经过了唐太宗时期的“贞观之治”和唐玄宗时期的“开元盛世”,唐朝又出现了什么局面呢?大诗人杜甫在他的一首《忆昔》诗里这样描述:“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廩俱丰实。九州道路无豺虎,远行不劳吉日出。齐纨鲁缟车班班,男耕女桑不相失。”

杜甫说,想当年唐玄宗开元全盛时期,连小的村镇也有家资过万的富裕人家。稻米像流脂粉一样,粟米泛着白光,国家和私人的仓库都装满了粮食。社会治安状况良好,出门远行也不用挑选日子。产于齐地的纨和产于鲁地的缟行销全国各地,男耕女织,不失农时。这就从侧面给我们描述了“开元盛世”的大概情况。

中华文明的西安元素

由于长期作为都城,西安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,并给中华

方建立过后秦政权,后因战争势力渐衰,今聚居于四川大巴山地区,因陕北曾为羌族的重要活动区域,有关羌的地名在陕北多有分布,如洛川县的上铜堤、下铜堤,就是由羌姓同路演绎而来,但更多的地名是以汉族文化心理而出现的。

镇羌堡,也可能是出于对羌人犯边的恐惧记忆,直到明代,朝廷仍高筑墙、广筑堡。成化二年(1466)依尚书王复奏,在今府谷境内修筑镇羌堡,可以说目的明确,与拒墙堡、拒门堡、助马堡一起被称为塞外四堡。可能是寓意过于直白而暴力,1952年改为新民,今属府谷县的一建制镇住地。

羌村,作为中国人都知其一二,在今富县。鄜州羌村因史圣杜甫的《羌村三首》而名垂青史,为世人关注。羌村无有贬意,也可能曾经是羌人的生活区域而留下的标记。因清代有杜甫“粉丝”打诗圣品牌办酒房,名气渐大,导致酒房号逐渐代替了村名,“圣”发音变异为“申”,今为富县岔口乡大申号村。这也许就是商业

征战中,文化攻防也是重要武器,这在陕北地名中屡见不鲜。

羌族,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古老民族,因“羌笛悠悠霜满地”“羌笛何须怨杨柳”等诗句而为人熟知。原本是广泛分布于北方、西北的游牧民族,晋时,在北

谈谈徐志摩配眼镜

徐志摩是近视眼,一目了然。关于他第一次配眼镜的时间地点,韩石山《徐志摩传》(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10月版)这样说的:

也是在开智学堂上学期间,他的眼睛近视了,家里给配了眼镜。第一次戴上眼镜,天已昏黑,在硖石泥城桥附近和一个朋友去走走路。把眼镜试戴上去,仰头一望,异哉,好一个伟大蓝净不相熟的天,张着几千百支银光闪烁的神眼,一直穿过他的眼镜眼睛直贯他灵府的深处,不禁大叫道:“好天,今天才规复我眼睛的权利!”

这段文字的意思是,志摩读小学时,家里给他在硖石配了眼镜,志摩第一次戴上眼镜,走在硖石的泥城桥上,整个场景都发生在徐志摩的家乡硖石。可惜,这番话实在是师心自用,不符合事实。

徐志摩说自己13岁,应为虚岁,所以是1908年之事,当时,志摩确实在硖石的开智学堂上学,这一点没错。但是韩石山平添了两个元素,是徐志摩原文中没有的,即“家里给配了眼镜”和“硖石泥城桥”,这两个因素是息息相关的,既然是家里配的,也就是在家乡配的,所以就走了硖石的桥上。但是志摩的眼镜不可能在硖石配,硖石也没有“泥城桥”的地名,这仅仅是想当然耳。

先看看泥城桥的问题,泥城桥其实在

上海,目前,这座桥的正式名字叫“西藏路桥”,在上海的闹市区西藏中路上,横跨苏州河。因此有人认为,徐志摩当年走的是这座桥,也就是走在西藏中路上,走上西藏路桥,即泥城桥,跨过了苏州河,那也是错解。当年,徐志摩不是走在如今的西藏中路上,因为那时的西藏中路还是一条河,叫做“泥城浜”,徐志摩是走在南京路上,走上泥城桥,跨过了泥城浜。这是两条完全不同的河与桥,苏州河是东西向的,泥城桥位于西藏中路,是南北走向的;但那时的泥城浜是南北走向的,泥城桥在南京路上,是东西走向的。

那么,上海人为什么把西藏路桥称为泥城桥呢?说来话长。

1912年泥城浜被填没,当年泥城浜东侧沿河浜有条小路叫西藏路,河道填没后,成了大道,就是现在的西藏中路。20世纪20年代,建造了新的泥城桥,成为上海南北主干道西藏路上横跨苏州河的一座桥梁,正式的名字叫“西藏路桥”,但上海人由于历史上的泥城桥名气响亮,习惯仍然叫“泥城桥”。

徐志摩第一次配眼镜理应在上海的一个原因是,当时的硖石甚至海宁都没有眼镜店,即使上海的眼镜店也不多。20世纪初,英国人约翰·高德在上海开设了“高德洋行”,专营机磨验光眼镜,据称是上海

首家西式眼镜店。后来,其他洋人也效仿此举,如托拔丝开设了“明晶洋行”,英籍犹太人雷茂顿开设了“雷茂顿洋行”。1911年曾在高德洋行工作过的中国员工筹资开设了“中国精益眼镜公司”,才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的机磨验光眼镜店。

据19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上海指南》记载,当时上海也只有13家眼镜店,著名的如精益、精华、高德、明晶等9家全都集中在南京路。因此当年徐志摩应该是在南京路配了眼镜,沿着南京路往西走,走上了泥城桥戴上新配的眼镜,喜出望外。

当时徐志摩虚岁才13,一个孩子跑到上海配眼镜,似乎不太可能,应该是父亲徐申如带他去的。志摩的父亲徐申如也是近视眼,早早地配了眼镜,随着机磨验光眼镜的出现,趋时务的徐申如替儿子配一副机磨验光眼镜,是极其自然的事。加上徐申如屡次到上海,对上海十分熟悉,所以帮志摩配眼镜也是轻车熟道。

所以,徐志摩的眼镜是父亲陪同下在上海配的,当无问题,这大概也是徐志摩第一次到上海。只是徐申如没有继续陪儿子玩,却让志摩的“一个朋友”陪着走走路,可见徐父对儿子并非娇生惯养,志摩也是个独立性很强的孩子。凑巧的是,徐申如和徐志摩第一次到上海的时间,都是虚岁13,想想这一对都属猴子的父子,真是“猴

文明宝库贡献了很多瑰宝,突出的比如:

第一,形成了“西漂”时代。长安政治中心、经济中心的地位,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吸引着全国各地的人才。就像今天,各地人才向往北京,形成了一个“北漂”潮流,在三大盛世时期,各地才子佳人“西漂”长安。

第二,铸就了“大一统”观念。从秦始皇在咸阳建立秦朝开始,我国形成了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,经过汉唐盛世的培育,国家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,统一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。

第三,奠定了汉民族雏形。在我国的民族构成中,汉族是第一大民族,一直占全国人口的90%以上。为什么叫汉族?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汉族是在建都长安的西汉时期初步形成的。而后,又经过了东汉,我国的主体民族逐渐被认同为汉族,中国主体文化被称为汉文化。

第四,使唐人街风靡世界。移居到海外的华人一般都喜欢集中在一起居住,这些华人的聚居区,往往以“唐人街”来命名。这是为什么?因为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至顶峰的一个朝代,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大。所以,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,都愿意拿唐朝说事;海外华人更以盛唐为自豪,愿意把华人聚居区称为“唐人街”。

此外,汉武帝时期,张骞开辟了中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大通道“丝绸之路”。从此之后,汉唐长安可以很便利地和中亚、西亚、欧洲,乃至非洲进行经济和文化往来。通过丝绸之路,中国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和文化典籍传到国外,西方的石榴、葡萄、西瓜等植物,以及绘画、音乐、舞蹈、宗教等传到内地,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。同时,大量的外国人在长安经商、学习,甚至定居下来;长安人口达到数十万,成为当时世界上知名的国际大都市。

长安,成为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吉祥、最响亮的名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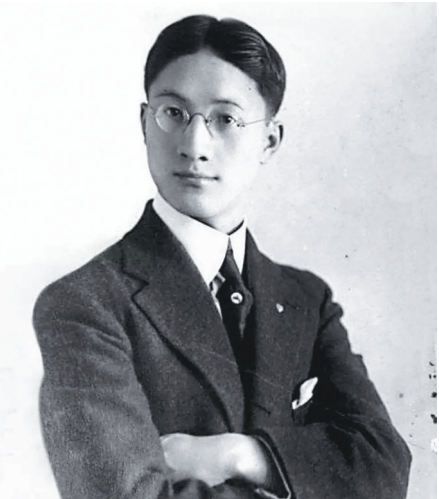
□程遂营

陕北地名中的羌秘密

氛围的特殊功效,而我固历来不乏,今天仍是,有这种去真存伪、以商凌文的实例。

平羌,顾名思义,望文思义,是汉人单向思维的一种心理诉求,至于这里有无平羌的战果已不得而知。不幸的是,对于命名者来讲,由于时间的推移与羌人的迁徙,解除警报后,人们早已失去了也许不应有的警惕,这个赋予特殊寓意的原安塞县村庄,今发音、文字均已失去本色,成了安塞县的一个镇子——坪桥。

无独有偶,汉中市也有个宁羌县,县名不言而喻,目标明确。民国年间陕西三杰之一的于右任,从民族团结角度,建议改羌为强。1964年,经国务院批准,宁羌县改为宁强县。孤立看,这些地名也许没必要被人重视,但如果把陕北这几个地名,与汉中的宁强(羌)县连线,再看现在紧靠宁强的羌人的聚居地北川、汶川,人们不难发现,那正是一条羌人的迁徙路线,也许是一条血泪生命线,这不是因陕北地名,让历史告诉未来呢? □王六



徐志摩

子称大王”。

三年后,郁达夫和徐志摩成为同班同学,达夫称志摩是:“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。”这副眼镜对郁达夫印象太深刻了,当然,这是徐志摩的原配眼镜,于是我们知道了,“神眼闪烁”的那晚,志摩配的是“金边眼镜”。

从此,“金边近视眼镜”成了徐志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徐志摩形象的“标配”。

□王从仁

人物春秋